

上海： 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编

苏智良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编

苏智良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苏智良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ISBN 7-5326-1622-3

I. 上... II. 苏... III. 上海市—地方史—研究—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999 号

责任编辑 刘大立

封面设计 何香生

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373 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5326-1622-3/K·266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

- 兼论边缘文化的积聚及其效应…………… 姜义华 (1)
- 创造人和——略论新时期上海的移民战略…………… 葛剑雄 (18)
- 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 熊月之 (27)
-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
- 以上海为例…………… 许纪霖 (59)

- 上海设市的历史地位…………… 周振鹤 (82)
- 上海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历史回顾…………… 朱 华 (86)
- 人·建筑·空间·文脉 …………… 忻 平 (109)

- 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 潘建国 (133)
- 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1912—1921) …………… 周 武 (160)
- 传教士与墨海书馆 …………… 苏智良 彭善民 (184)
- 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
- (1927—1937) …………… 廖大伟 (194)

- 外滩:“十里洋场”的开端…………… 李天纲 (204)
- 19 世纪时上海人怎样看租界 …………… 冯绍霆 (211)
- 早期上海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 汪朝光 (222)

-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 …………… 唐力行 (238)
- 近代上海同乡团体的社会联系及功能 …………… 郭绪印 (255)

城市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

- 整体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 高红霞(272)
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戴鞍钢(287)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

- 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 周育民(295)
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白华山(313)
积极与徘徊:五卅运动中的商总联合会 孙爱民(324)

沪上民间信仰刍议 范 荧(336)

试论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 姚 霏(345)

东京:国际大都市之路

- 兼论对上海的启示 苏智良 沈晓青(358)

后记 苏智良(370)

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

——兼论边缘文化的积聚及其效应

姜义华

一、文化体的构成与边缘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一个融合继承与更新、保全与创造于一体的动态的发展运动过程,但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它又是一个不断再生与重复的相当稳定的立体的存在。如果将文化视作一个球体,那么,可以看到,它大致由三个层次构成:内层,是核心文化;中层,是主干文化;外层,是边缘文化。

核心文化,指的是人们在历史的创造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认知价值取向、抒情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生价值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经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由它们构成的价值体系是各个文化体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它们决定着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构成了文化的特殊本质。这种价值体系,也表现于主干文化和边缘文化之中,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主干文化和边缘文化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支配力强弱程度不同。一般说来,在主干文化中,支配力较强,而边缘文化中,支配力则较弱。

主干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知、情、意在历史的创造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实践体系,包含人们认识已知世界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实践,科学思考和科学发明的实践,依循特定的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将生活目标付诸实现的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艺术追求和艺术创作的实践等等。每一文化体的实践体系,构成了这些文化的主体,它不仅包含着精英文化中的主要部分,而且包含着大众文化中的主要部分,直接表现为人们的各类文化活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品,包含观念的、物化了的以及制度化了的各类文化产品。

边缘文化,相对于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而言,指受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影响相对薄弱,乃至对这一价值体系表现出某种疏远或离异倾向的文化区域、文化活动、文化事业、文化人以及相应的文化产品。边缘文化和核心文化、主干文化为同质文化,而不是异质文化。但是,在特定文化体中,它终究是变异性最强、离心力最为活跃,而排他性较弱、与异质文化交流最为容易的部分。

边缘文化的形成,有多种情况,就中国而言,它主要经由以下几个途径形成:

首先,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各个区域的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长时间中,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山林文化并存,相对于占支配地位的农耕文化而言,草原文化、山林文化是边缘文化;而在草原和山林地区,草原文化和山林文化又是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草原文化、山林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区,又成为边缘文化。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占据优势地位的汉族文化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属于边缘文化;但对于许多历史悠久、自具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又是核心文化,民族杂居地区的文化则常常成为边缘文化。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即便在同一区域、同一民族之中,文化也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异。

其次,在文化整体中,有一部分作为价值体系的体现者非常直接,非常强劲,非常厚重,另外有一部分,虽然也处在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之下,但是,它们作为文化活动、文化事业展开时,作为文化产品被制作出来时,技术性特别强,形式化发展程度特别高,这样它们就较易于依托这种形式化和技术性而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从核心文化和主干文化中分离出来,而成为较易传播、扩散和移植的部分,形成边缘文化。除此之外,文化中工具性较强以及娱乐性、消遣性或世俗性较强的部分,距离核心文化都较远,也多具有边缘文化性质。

其三,特定的文化体以特定的价值体系为其核心文化,但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推移中,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的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融合了法家、道家而形成的儒表法里、儒道合流价值体系,先秦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特别是曾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墨家,纷纷从主流文化中游离出来成为边缘文化,甚至儒家、法家、道家中若干流派也从主流文化中游离出来成了边缘文化的一部分。在儒学与佛

学合流形成宋明理学,并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显学之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价值体系成为核心文化,与此相异的其他各家的价值追求,便游离出来成了边缘文化。当然,边缘文化也可能演变成为核心文化的构成部分。佛学初传入中国时,是边缘文化,到南北朝、隋唐时,成为中国核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朴学刚刚兴起时,曾经是边缘文化,乾隆、嘉庆年间已经在核心文化中确立了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在成为核心文化、主干文化之前,它们终究属于边缘文化。

其四,人是文化的载体,但是,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个人身上,他们各自所凝聚的文化,内容与分量都不可能一样。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构成中,士更多代表了核心文化,农工更多代表了主干文化,重农贱商、强本抑末,使商更多处于边缘文化地位。而大多为文盲的农工,虽然是许多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主要承担者,许多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他们当中那些对文化极少参与,或仅限于参与技术性、工具性、世俗性、娱乐性部分较强的文化活动者,实际上,也接近于边缘文化层面。

迄今文化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大多是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对边缘文化几乎很少注意。而在考察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接与冲突时,经常都将每一文化体视作绝对统一的整体,很少注意各个文化体中核心文化、主干文化及边缘文化的不同地位、不同特点,对于边缘文化的独特地位与独特意义更是完全没有触及。

二、中外多种边缘文化在上海的积聚

上海自1291年8月9日(元至元二十八年农历七月己未)建县,至1842年8月29日在《中英江宁条约》中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历时已五百五十一年零十天,文化积累已有相当基础。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体中,上海与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苏州、杭州、宁波、绍兴等地虽然近在咫尺,与吴文化、越文化、浙东文化、浙西文化、徽宁文化中心区都相距不远,却并未完全融入这些区域文化之中,它所积累的实际上是一种边缘文化。

这是因为上海县城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主要依仗于商业贸易。《法华乡志》曾指明:“上海一隅,本海疆瓯脱之地。有元之时,始立县治于浦滨,斥鹵方升,规模粗具。自明至让清之初,均无所表见。”1685年清廷解

除海禁,1686年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其中江海关设于上海,给上海提供了特别机遇。乾隆《上海县志》就此专门指出:“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栳。”商船北方来自天津、东北,南方来自福建、广东、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上海由此而成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之地^①。当时,活跃在上海县城的大多为客籍商帮,本地商贾不过占十之二三。客籍商帮中,有历时久远的徽商和秦晋商人,有浙江宁波帮、绍兴帮,有湖南洞庭商帮、关东帮、山东帮、江北帮、广东潮州帮、福建泉漳帮,以及江西商帮等等。他们中不少人在上海落籍定居,致使上海居民多客籍,上海由此成为一座商业城市,一座买卖的城市。

作为一个商业城市,上海在以农耕文明为主要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处于边缘文化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客籍商人,虽然带有他们本籍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但他们也都不是这些地域核心文化的代表者。他们的商人身份和经商行为,决定了他们在本籍地域文化中,只能处于边缘文化地位。上海自身的边缘文化基础,众多地域边缘文化经由商帮杂凑于上海而彼此互相争雄,这一局面,使上海在文化上没有核心文化地区那样的凝固性、稳定性和排他性。开埠以后,上海便能够很自然地接纳蜂拥而来的中外各种边缘文化,并具有足够的文化基础和开放心态来消化和融合这些边缘文化,使上海迅速成为中外多种边缘文化的积聚地。

给上海带来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边缘文化的,是纷纷在上海登陆的外国冒险家、外国商人和其他外国侨民。1843年底,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的外侨人数为26人,1865年公共租界登记的外侨为5129人,其中居民2297人,其余为英国士兵和海员。法租界1848年外侨10人,1865年为460人。来沪的水手、流民以及不愿去登记的外侨,未包括在内。19世纪50年代后,每年来沪的洋船船员、水手,少则数千,多则万数。1905年,公共租界外侨增至11497人,法租界增至831人;1910年,两租界外侨更增至15012人。这些外侨,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环境。1865年公共租界5129名外侨,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法租界460名外侨,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1905年公共租界外侨11497人按国籍分计,为英国

^① 毛祥麟:《三略汇编》,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8页。

3713人,日本2157人,葡萄牙1331人,美国991人,意大利785人,印度568人,法国393人,俄国354人,匈牙利158人,意大利148人,西班牙146人,丹麦121人,100名以下为瑞士、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等国^①。以职业构成而论,开埠之初,来上海的多是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洋行大班、外交官员、传教士、众多的海军士兵和商船水手,还有一批逃离本国的罪犯、无职业的游民和流氓歹徒。这些成员,显然不是他们本核心文化的代表者,由他们带到上海来的,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边缘文化。他们用在上海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在外滩,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以及租界外兴建了一座座仿效他们母国风格的建筑物,以各式花园洋房作为居室,以古希腊式、古罗马式、哥特式等表现欧洲各种不同文化风韵的高楼大厦作为办公大楼,使上海特别是外滩成为“万国建筑博物馆”。他们给上海带来密切关系人们日常生活的油灯、煤气灯、电灯等新的照明工具,自行车、火车、汽车等新的交通工具,邮局、电话等新的通讯手段,咖啡厅、鸡尾酒、西式大餐等新的饮食文化和社交方式,交谊舞、爵士乐、赛马、溜冰、足球、棒球、板球等新的娱乐方式和体育活动。这一切基本上属于边缘文化范围,它们既有文化内涵,又非常实用,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惊诧和将信将疑之后,很快就为上海所接受、所袭用、所热衷,并由此而使人们以一种比较自然的态度去理解和接纳西方的主干文化乃至核心文化。

较为系统地向上海引进西方边缘文化乃至主干文化的,是以传教士为主的一些西方文化人和文化经纪人。上海开埠后,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外侨社会形成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推进各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由一批传教士带头,一些西方文化人来到上海,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西文报纸杂志,随后,又创办起一批中文报纸杂志,创办起一批学校、医院、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组织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使西方思想、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在上海,并经由上海在中国许多地方传布开来。熊月之、张敏所著《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表2—1《晚清上海外文报刊录要》^②,共列英文报刊28种,法文报刊9种,德文报刊2种,大部分刊载新闻,一部分偏重体育、娱乐,极少几种偏重学术,都由外人创办和担任主笔。最初的上海中文报刊《六合丛谈》、《上海新报》、《教会新

①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8页。

报》、《申报》、《万国公报》、《格致汇编》也都是外人创办，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为传教士。该书表3—5《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目录》^①所列译书150余种，除少数几册由中国人译自日文外，译自西文的几乎全都由西方传教士主持译述，其中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就译了77种，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方面。150余种中传教士所译就达115种。该书表5—1《晚清上海教会学校、租界当局和其他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名录》^②，列学校41所，其中教会所办33所，租界工部局、公董局所办6所，其余2所，一为日本东亚同文会所办，一为德国医学博士所办。传教士们还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同文书会，后来改名广学会，翻译、编撰和出版西学书籍，向中国推广，1887年至1911年共出书461种，其中纯宗教书籍138种，非宗教性书籍238种，含宗教内容兼其他内容的85种^③。

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这批西方文化人，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具有西方边缘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一，他们所做的主要是文化传播工作，他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或工具性。傅兰雅一人，即为江南制造局和益智书会等译书近130种，其中有数学15种，物理学17种，化学9种，天文、地质及气象7种，生物学3种，制造类18种，工程测量10种，医药卫生8种，航海工程5种，农业2种，炮术3种，水师4种，防御3种，社会科学10种，还编写了42种教科书。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多，正因为他所做的主要是现成著作的译述和介绍工作。其二，他们所传播的文化，就其内容而言，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或普及性，而这种知识性或普及性又经常与宗教性并不相涉。伟烈亚力协助翻译了《谈天》、《西国天学源流》、《续几何原本》、《数学启蒙》等一批西方科学著作，传教士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竟一身而二任，尽管宗教与科学常常互相冲突。其三，他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和在上海的中国学者沟通与合作，努力使他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他们的翻译，大多采取了和中国学者联合进行的方式，由他们口译，由中国学者笔述。这种方式使他们能够较快和较方便地了解如何使他们的成果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他们还努力使自己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85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5页。

③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5月版。

的工作和清廷正在推行的洋务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做有力地帮助了他们的成果被迅速应用。

在上海成为世界多种边缘文化汇聚处所的同时，随着大量移民从中国各个省区纷纷涌入上海，上海又成为中国各种地域边缘文化的交汇点。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至1864年太平军进军江浙期间，上海县城及江浙大批难民逃入租界，冲破华洋分居禁令，形成华洋杂处局面，更使中国各地域边缘文化和国外各种边缘文化密集地交汇在一起。

上海租界人口在1860年初，一度达到50—70万人之多，其中90%以上为华人。太平天国失败后，大批难民回归江浙家园，租界华人减少到14万人。此后，随着上海商贸和工业急速发展，经济结构迅速转变，移民又逐步增加。至1910年，租界内华人再次增至50余万。租界以内的华人中，上海籍仅占18%，其余都是外地移民。租界以外上海人口70余万，也是外地移民数量超过上海本地人口。客籍移民中，开埠之初以广东、福建人最多，1853年前后，分别达8万人与6万人。太平军进军江浙后，江浙移民逐渐增加，并取粤闽地位而代之。1910年公共租界41万华人，按省籍依次为：江苏，18万人；浙江，17万人；广东，近4万人；安徽，5263人；河北，4623人；湖北，3353人；山东，2197人；福建，2134人；江西1488人；其余为四川、河南、湖南、广西等省人^①，这些移民，上层是一批买办、通事及实业家，其中广潮帮、宁波帮、苏州帮、徽建帮影响最大；中层为一批职员和产业工人，他们也分作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等各种帮口；底层为大批苦力，主要为苏北人（或称江北人）。这些移民，原先或经商，或务农，或从事手工业，在传统文化中也大多属于边缘文化层面。他们带到上海来的各种地域文化，基本上是流行于民间的世俗文化，包含饮食、衣着、风俗、习惯、娱乐方式等等。移民来到上海的，还有前求学力、谋深造的各地青年学子，来上海当寓公的失意政客和落魄军人，雄心勃勃要在上海闯荡江湖的帮会成员，他们带到上海来的同样只能是各地域的边缘文化。上海流行许多地方戏，除去京昆等所谓大剧外，评弹、锡剧、越剧、淮剧、扬剧、甬剧、粤剧、黄梅戏等等，在上海市民中各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而且这些剧种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在上海逐渐形成和

^① 见《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第305页。

兴盛的。市民的这种文化兴趣，清楚地表明庞大的移民群原先在各种地域文化中的实际地位。

随着上海的发展和移民的结集，一批文化人也陆续从各地向上海汇聚。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至90年代初，他们在外国人所办的报馆、杂志社、出版社、学校等文化机构中作一些辅助工作，或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洋务机构中和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文著作，在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及其他国人所办或中西合办的新学堂中担任教习，在国人所办的报社杂志社中担任主笔或记者。当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文化人，就有4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仅中过秀才，或仍是布衣，社会地位不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边缘文化人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中国传统士人眼中，常被视为非正途，无足轻重。然而，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最先接触到西学和新型文化事业。他们中的佼佼者，在这一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与创业。李善兰、华蘅芳和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方数学著作，创立了许多新的数学概念、数学名词，成为晚清最有成就的数学家。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徐华封和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方化学著作，主持开展化学实验和化学研究，并取得制造硝酸以取代进口口的实际成果，成为化学化工专家。这些文化人还和西方教习一起，培养出相当一批接受了新知识教育的优秀人才，从19世纪末以后，逐渐在中国各界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工作的成效表明，中外边缘文化的聚积，在上海已经产生了最初的积极效应。这种积聚，将有力地推动新文化的孕育与诞生。

三、新型价值观念在上海的孕育

近代中国新思想最初多发端于广东珠江三角洲。这是因为那里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又和此前中国唯一面向欧美的窗口——澳门最接近，广州的十三行和欧美各国已有多年交往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又通过香港较快地接触了外来文化。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正是凭藉这一特殊环境，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樊篱，睁眼看到了一部分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命运作出了新的思考。孙中山身在侨乡，自幼就到檀香山去接受教育，以后又在香港深造，他的思考因此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包含着对世界更多的理解，这一条件为当时其他地区所不具备。但

是,新思想虽然纷纷在珠江三角洲诞生,广州却并没有因此而成长为新文化的全国中心。广州也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也有外国租界。然而,华洋分居,租界所在地沙面成为游离于广州城的一座孤岛,移民来到广州城的新居民,大多是广东本省人,因此,广州并未因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而自然变成各种边缘文化的汇聚之所,一般居民传统观念的转变就相对比较缓慢。

上海和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不同。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上海没有产生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类出类拔萃的新思潮领袖人物,但是在中外各种边缘文化积聚基础上,上海在社会各不同阶层中孕育了一整套新型的价值观念,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核心文化正在这里萌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新型文化人汇聚上海,以上海为依托,催化了新型价值观念体系的诞生,并由上海将新思想、新文化推向全国,使上海迅速成长为新文化的全国中心。

新型价值观念的孕育,指的是在上海经济转型和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各种边缘文化的聚合、交流和发酵,首先在广大移民中,进而在上海本籍居民中,相当普遍地形成了新型的自由意识,竞长意识,实践意识,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

首先是自由意识的形成。移民们大多孤身一人来到上海,他们离开了原先家庭、家族、乡里,也离开了原先的族规、家训、乡土各种传统制度的拘束,在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成了一个必须独立去拼搏的自由人。人们有了择业的自由,有了婚姻的自由,有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了追逐前途的自由,尽管这些自由仍然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却是人们过去从未享有过的。在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中,个人只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伦常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从来不是一个独立者,他的生活和命运大体由等级秩序规则所决定。他们或者经由十年寒窗苦读通过科举登上仕途,或者在窄小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度过一生,职业、居处、婚姻、信仰,自己都难以自由选择。而上海,则给人们提供了成为独立的个人的宏大空间。原籍浙江定海的刘鸿生,年轻时在圣约翰大学凭奖学金得到良好教育,因家道中落又不得不中途辍学,先后到工部局老闸捕房当中文教员,到会审公廨当译员,到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当办事员,21岁到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工作,由办事员升任买办,与人合伙开煤号,短短几年,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变成百万富翁,其

后成为中国的“火柴大王”。并非人人都能取得同样的成功，但是，它确实表明，在上海，比之在其他地方，人们更能自由地实现自身的价值。

其次是竞长意识的形成。中国传统的占支配的地位的意识是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知足常乐，重守成而恶创新，一切依循古制古法，害怕变动不居。然而，依循这种传统观念，在上海就无法生存下去。上海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有太多的机会，也有太多的竞争，使得人们能够凭藉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去捕捉这些机会，以便在竞争中胜出而不被淘汰。而利益的驱动，审美观念的变化，认知方式的改变，也不容许人们安于贫困而不去力谋改善。而要实现这些利益、审美、认知的新的目标，使自由成为现实，更必须自觉地力谋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移民来到上海的绝大多数是青年，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他们更急于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准，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以新的素质及时捕捉各种机会，而正是他们，给上海注入了强大的青春活力。这种竞长意识，使得上海教育水准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改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满足现状而力图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三是实践意识的形成。这里所说的实践和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以及道学家们“修心养性”的“实践”是不一样的。实践意识，又可称为行动意识。由于上海昼夜不息都处于变动之中，成长之中，到处都充满了诱惑，充满了问题，充满了困难，充满了挑战。要在上海立足，在上海生存，人们必须勇于面对现实，勇于实践，勇于行动，直面种种诱惑，解决种种问题，克服种种困难，迎接种种挑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在行动中不断成长，在探索与冒险中实现飞跃。无论是沙逊、哈同那样成功的外国冒险家，还是荣氏家族、郭氏家族这样成功的企业家族，无论是使上海成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上海中产者，还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无产者，连同产生了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那样“海上闻人”的上海黑社会，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大多具有这种引人注目的实践精神。如果说，自由意识、竞长意识在许多现代都市中都能形成，并非为上海所独有，那么，这种实践精神，行动意识，探索与冒险的勇气，却可以说是上海独领风骚。

其四是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一般都用一年四季和24节气来把握时间，数量的日常运用比较笼统，对于外界信息，“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除去对上天能否提供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深为关切外，其他都很少过问。可是，在开埠后迅速发展的上海，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事业。无论是在商贸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把握都越来越重要。上下班不能逾时，交易不能逾时，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能把握先机。至于数量，不仅在现代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中，投入与产出以及其中所有中间环节，需要精确的量的控制，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项收入与每项支出，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量的价值终于为人们所发现，成为人们生活的杠杆。至于信息，人们从来没有像在上海这样同时遇到如此丰富的信息，也从未像在上海这样深切地感受到所有这些信息与他们的工作、生活关系如此密切，人们不仅与上海本身结为一体，而且经由上海，与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时间、数量和信息意识，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人们开始具备现代人素质。

自由意识，竞长意识，实践意识，以及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形成了一整套与中国系统体系有着重大差异的新的价值体系。而这一新的价值体系，则成了上海城市超常发展与成长的精神支柱，也使上海在 20 世纪初逐步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中心，有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当《青年杂志》1915 年 9 月 15 日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由此发动时，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号召人们应当成为具有新时代素质的人，他就此提出六项指标：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实际上，就是要求确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而这六项指标，其实正是上海所孕育与形成的自由意识，竞长意识，实践意识，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的别一种概括，而它在上海的提出，则正宣告：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确立。

四、上海新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中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可以说已初显端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确立，二三十年代则进一步巩固。

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新的价值观念虽然已在孕育，但是要使这些新的价值观念得到加工、锤炼、提高和系统化，在人们的知、情、意文化活

动、文化实践中立体化地得到实现，形成丰满的主干文化，还有待高层次、高水准的文化精英在上海的积聚和他们的艰苦工作。

高层次、高水准的文化精英在上海的积聚，大约经历有三个阶段。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作为鼓吹维新变法的主要喉舌，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章炳麟等人为此移往上海。戊戌维新失败后，容闳、张元济、蔡元培等纷纷离京到上海避祸。八国联军之役时，严复自天津至沪。20世纪初年，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还有江苏的张謇、马相伯、黄宗仰、刘师培，浙江的夏曾佑、王国维、杜亚泉，广东的邓实、黄节、苏曼殊，广西的马君武，福建的林纾，湖南的唐才常、章士钊，四川的邹容，河北的张继，陕西的于右任等人。这些文化人和甲午战争前来到上海的文化人显著的不同，一是他们旧学根柢都很深，二是对新学都有较为深入的专门的研究，三是他们积极投入了变革中国社会的革新运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各种地域文化，曾经深入堂奥，但又终于从中走了出来；他们对于西方各种文化，也不局限于对其边缘文化的感知与认同，经由深入的比较与思考，他们对各类外来文化的内核心部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从日本、美国、欧洲留学归来的文化精英汇聚到上海。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等从日本留学归来，胡适、任鸿隽等从美国留学归来，总部设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农学会中，留学生出身的占有极大比重，他们对欧美、日本的文化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同时，又能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较为全面的批判性的审视，这样，他们在创建中国新文化方面，较之上一辈的文化精英们，便能作出更为重大的贡献。从20年代中期开始，除去从欧、美、日本继续有大批留学生归国外，还有相当一批在苏联接受了较为系统教育的留学生来到上海，他们分别给上海带来了这些不同国家迥然有别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文化。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基地，1930年2月15日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2日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7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戏剧作家联盟，1930年8月成立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积聚了上海当时左翼文化精英力量；上海同时成为自由主义文化运动、国家主义文化运动的基地，成为其他许多政治色彩比较淡薄的学术、教育、文化运动的基地。这是因为这些文化精英们或者力图将国外某种核心文化移植于中国，或者